

basibazi ziliao
yu menggu ziyun

八思巴字資料 与蒙古字韵

宋洪民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八思巴字資料 与蒙古字韵

宋洪民 著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宋洪民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 - 7 - 100 - 13891 - 8

I. ①八… II. ①宋… III. ①八思巴字—研究
②蒙古语—韵书 IV. ①H212.2 ②H2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77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

宋洪民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891 - 8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2 1/2

定价:98.00 元

序

宋洪民教授著《八思巴字资料与蒙古字韵》是近年来汉语语音史领域内取得的重要的成果之一。作为曾经与他一起学习和研究过（2001—2004）的相知相识，见到此专、深、精、透、博的新成果，忻喜云何！感慨云何！

八思巴字和蒙元语言研究，经过前辈学者的艰苦开拓，几代人的奋力掘进，或以照那斯图先生、杨耐思先生和宁忌浮先生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代表，至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似“已当凌绝顶”，一般认为，至少是系统可说，成批可道的不很多了。2008年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的宋洪民君，在导师照那斯图先生的指导下，受照那先生“整理八思巴字汉语实际文献材料”思路的启发，立下“八思巴字汉语实际应用文献材料的全面整理与音系归纳”的宏愿。2008年8月我在南昌音韵学会议上见到他们师徒二人，除了诚贺照那先生收授高徒之喜，悦其和聂鸿音先生等的伯乐识之外，对谈及的研究思路再攻八思巴字的构想有点诧异：从龙果夫、罗常培到晚近杨耐思、宁忌浮，相关课题资料都被这些专治汉学史、语音史、音韵学的大家搜遍，都有重要成果问世了，构想似难切入呵！

谁也没有料到，切入点就在照那先生为其选择的文献整理上。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洪民视此为八思巴字研究的第二历史时期的起点）以来，“学者们似乎对《蒙古字韵》关注太多，而对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实际应用文献（圣旨碑刻等）却从来无人进行系统整理研究”，从无人问津处切入，这就是洪民君的学术的执着、自信和历史担当。洪民君著作的原名是《元代汉语音系研究：基于八思巴字

文献资料》不论是原名还是现名，皆明示可知，学术信念专注于文献，研究实践立足于文献整理，洪民君的成果，本质上是专门史、专题史文献学成果。文献整理和文献学，是清代学术的旧天地，现代早期老派学者的硬工夫，当代学子洪民君偏偏踵武于“旧学商量加邃密”，与时下之商品潮涌动路隔千万。洪民君首次对圣旨碑刻等八思巴字汉语实际应用文献进行全面整理研究，按韵重新编排，归纳其语音系统，从中得出一个真正的活的八思巴字汉语拼写语音系统。换言之亦戏言之，要是谁做个语音史实验，按洪民找到的“活系统”，用死文字八思巴字来拼写一部现代汉语文字书，也会熨帖合榫的。书中将八思巴字文献音系与元代韵书《蒙古字韵》比较，分析异同，确立后者的音系性质，乃至它在蒙元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中的地位。至于原本和《蒙古字韵》有关的前修《新刊韵略》，后修《古今韵会举要》，皆可推本八思巴字旧迹，还原八思巴字存在样态；和同时代的语音史界碑著作《中原音韵》的比较，又可在宋元韵书的传统及流变、北方官音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中细察八思巴字的影响和作用，八思巴字文献音系成了所有这些领域的存在者自身和研究实践的本体。总之，洪民君入于八思巴字文献音系，而又出于其文献音系，走向更广阔的语音史空间，这里，比较法，科学的还原法等历史语言学方法都与具体对象研究相结合而新生魅力。总之，洪民“新知培养转深沉”的宽广视域，又让我们歆羨。这自然会让我想到我对他的一贯了解，他的颖悟睿智触处可见，他的刻苦用功默默无闻。“好学近乎智”（《中庸》），两者是一致的。刻苦加睿智，亦所谓“聪明、老实二义”，不断地驱动着他的创新潜力。近年来他围绕一个中心“八思巴字音系”推出的系列论文，正是他的内生驱动力引擎从不停息的证明。

洪民的著作分上下两篇，上篇将八思巴字文献与《蒙古字韵》作对比研究，下篇八思巴字 58 种汉语文献的系统整理与研究。上篇除绪论外分五章：首章从文献与《字韵》的异同看《字韵》，二章言《字韵》声母系统，三章言韵母系统，四章言八思巴字拼写规则，五章从《字韵》看元代语音研究。工程浩大，皇皇巨著不下五十万字。全书既立足于文献，专注于文献，就脱不了学术研究史的干系。可以说，全书有两个本体研究，一是八思巴字文献音系与《蒙古字韵》的关系的

对象本体研究，一是引进历代学者研究成果，学术史本体研究。这两个本体融贯于全书，互相依存和促进，且前者是横向的，后者是纵向的。横向的就主要概念及其体现而言，纵向的就历代学者的阐说、揭橥而言，经作者的艰苦努力，横向和纵向形成综合，而非“两张皮”式的离散。在综合中，重点始终专注于第一个本体研究，而以第二个本体研究为参照点，以致全书形成“接着讲”的总格局。“综合”和“接着讲”，这本身就是对传统学术研究中必然遇到的“双本体”关系处置的创新。例如“八思巴字官印用字与《蒙古字韵》之比较”题，文中举出照那先生《元国书官印汇释序言》中的话，以八思巴字为“国书最重要的用途”，又举出罗常培、蔡美彪说官印“由中书礼部造发”，对“当时统一规定用蒙古字”起直接作用，循前贤之指点和思路，作者遂即展开他的大规模工程：对官印字作全面整理研究，将官印字全部编进统一的总字表，总字表的制订体例，即字头整体排列全部按《蒙古字韵》十五韵部进行。

又如，在《蒙古字韵》的研究中，遇到元代汉语中的特有的声母格局影、幺、鱼、喻、疑分立。该问题一直是一个难以索解的难题。文中引诸家之说如杨耐思（1984、1997）、李新魁（1986）、竺家宁（1986）、郑张尚芳（1998）、王硕荃（2002）等，认为他们的说法是“比较稳妥的”，“也确实符合事实，即声母确实会因所拼韵母洪细的不同产生音值上的差异”，特别是杨耐思先生在《汉语“影、幺、鱼、喻”的八思巴字译音》（1984）与《八思巴字汉语声类考》（1997）两篇文章中都阐述了这样的观点：这些声母在与韵母拼合上都表现出“洪、细”之分，所以必须采用音位归纳的原则，与同期的其他汉语音韵资料相结合，将影、幺、鱼、喻，合、匣分别合并，它们是八思巴字系统区别等第的一种表现手段。在时彦卓识的基础上，洪民提出了另一个独到之见：元代汉语声母“影、幺、鱼、喻、合、匣”的分立缘于八思巴字拼写系统的需要，喻三入疑就是由此而形成的特殊现象，其根源是八思巴字系统的“以声别韵”。八思巴字是一种蒙古文，它首先是用来拼写蒙古语的，它与藏语文、与蒙古文的关系更密切，适应性更强。而后才用来拼写元帝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的语言（照那斯图、杨耐思 1984；杨耐思 1997）；当其功能扩大到译写一切语言包括汉语时，拼写规则不适应处显然，需据汉语的

实际加以调整事属必然。洪民指出：存浊系统不允许零声母影、喻、疑等合并；牙喉音严辨四等要求影、喻、疑诸母等第不同则读音必异；汉语零声母与八思巴字符号的对应关系复杂；u类韵母假四等八思巴系统无相应韵母形式促成了以声别韵。总之，在零形式a的表达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诸母分立是八思巴字系统以声别韵的需要。这首先在逻辑上是能成立的，理论形态的逻辑系统的范畴在推理中获得功能意义时，范畴本身的真值性常常因逻辑语境的变化而变得内容丰富，范畴本身会获得某些鉴定和调整，以加强其真值性。十分重要的是，《蒙古字韵》声母系统格局只是个语言经验逻辑系统，无论是系统本身的构成，还是获得实践功能时，调整和改制因经验本身的丰富和多样变得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应当说及的是，洪民对第二本体的研究也是下苦功的。例如聂鸿音先生（1998）据回鹘文《玄奘传》的对音资料，提出汉语的见溪疑晓匣五个声母在回鹘文中依韵母的洪细分为q-、k-两类，可以引发我们对古汉语声母颚化现象的某些思考。洪民在充分肯定聂先生成就卓识的同时，具体到八思巴字，洪民认为，八思巴字中声母分立的是古汉语的影、喻、疑、匣诸母，见溪晓却并未分立，所以八思巴字中的这几个声母的分立似乎不是导源于声母的颚化与否。正是循此前行，才发现“诸母分立是八思巴字系统以声别韵的需要”。诚然，洪民这一事关八思巴字全局的解释还需要求真研究实践的反复检验，但至少是作为研究史的一个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是能自圆其说的。据称，洪民的这一发现是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悟出的，《庄子·达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中国的学问用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悟”而知之，不亦可乎！

藏文产生于公元七世纪，使用至今，脱胎于藏文（照那先生说）的八思巴字颁行于1269年，使用了八十多年告结（1352年）。韩国的谚文产生于15世纪李氏朝鲜王朝时期，此前鲜族人（即韩族人，“韩”匣元、“鲜”心元二字上古汉语都是元部字，且声母一为匣纽，一为心纽，心、匣二纽古通，上古匣纽字“慧惠”从心，心纽字“邃”从匣纽字“穴”）一直使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日本的平假名公元九世纪已经形成，片假名在平安朝时代（794—1185）为训读而产生，但一直到十八世纪后半期的明治维新时代才定下来。谚文、假名的使用也不是一帆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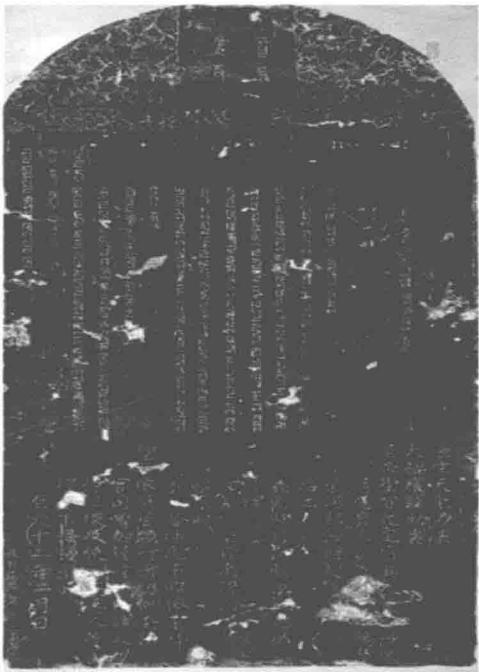
顺的，甚至可以说是艰难曲折的，日语汉字今天还在广泛使用，韩国的有识之士仍主张重要文献要用汉字书写。用汉字书写安南（越南）语，起于汉代，成于宋代，宋以后逐渐改革成喃字，但直至今天那里仍有人主张要完全恢复使用汉字。八思巴字是当年蒙元人以政治强势、文化弱势对付文化强势、政治无势者的。汉字文化圈内的谚文、假名、喃字的产生都是力图以政治弱势、文化弱势抗衡政治强势、文化强势者的。文化的抗衡，认同，融合、创新，乃至成功和失败等，是个极其复杂问题。洪民的著作，从学术性、科学性言八思巴字语言文字天地，攻坚克难，深邃博奥，弥足珍贵，对八思巴字在文化学上的价值性，是否也能给我们些许启发呢？这是需要另行认真思考的。文化学上的价值评判也是个重要的课题，但这显然已在洪民课题的视域之外。

我本人于八思巴字胸无点墨，洪民君将学习和欣赏其大著的机会先期相赠，十分感念。为不辞信托，不负期待，写下了以上感言，以求教于学界和洪民君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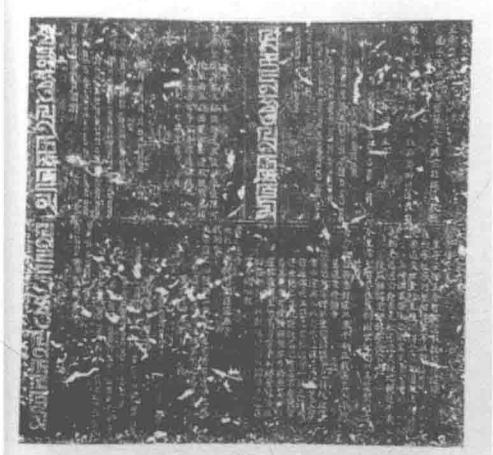
李开

2015年6月于澳门科技大学

一、圣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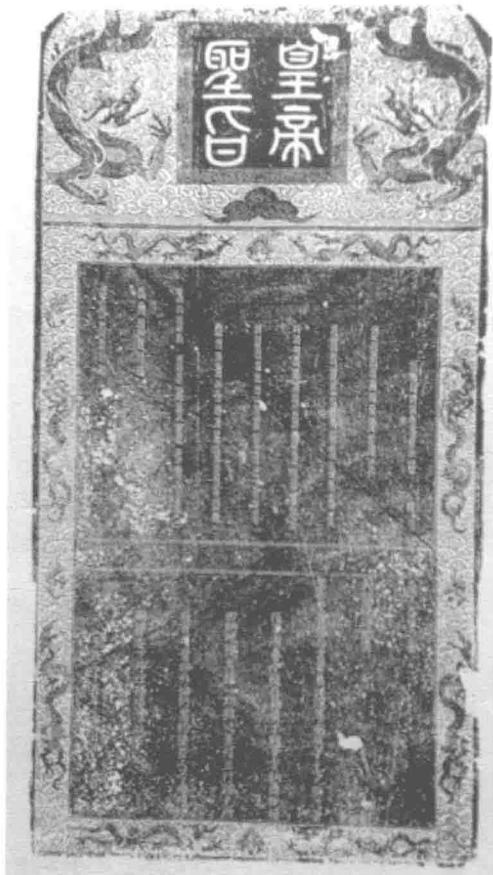


1. 龙门神禹庙圣旨碑，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一日，元世祖（以下各份材料中当时在位皇帝从略），陕西韩城。图：罗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增订本（以下省称罗、蔡“增”），页35图版四。另，胡海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八思巴字碑拓目录并序》1（以下省称“胡”）。照那斯图师所赠国家图书馆藏拓片（各地1366）少碑额，罗、蔡“增”所录图片碑额两侧无字部分为空白。最终高树伟君协助采用了最完整的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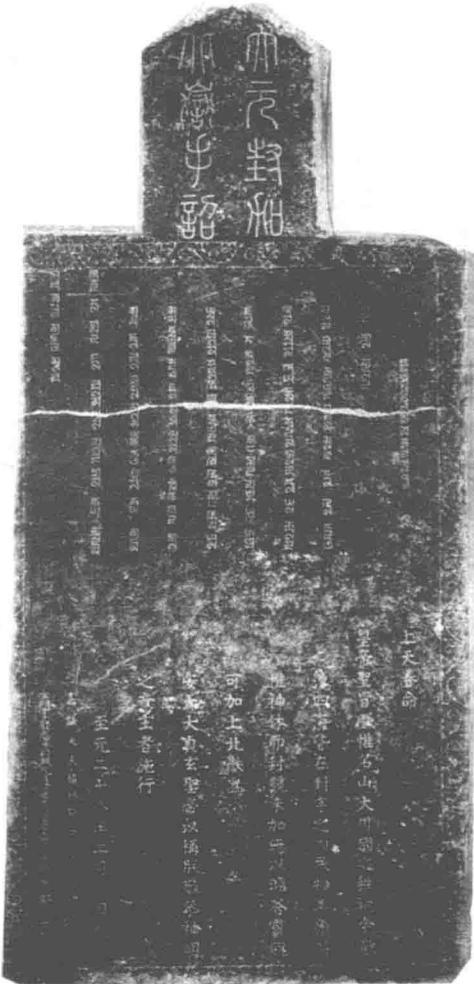
2. 重阳万寿宫圣旨碑，至元十七年（1280）正月一日，陕西户县。图：罗、蔡“增”页36图五。胡4。图片采自罗、蔡“增”。

上左半部



3. 儒学免役圣旨碑，至元二十五年（1288），浙江会稽。罗、蔡“增”页61图三十。胡6。

罗、蔡“增”所录图片无碑额，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拓片碑额两侧无字部分为空白，无图案，照那斯图师所赠国家图书馆藏拓片（各6211）最为完整，今采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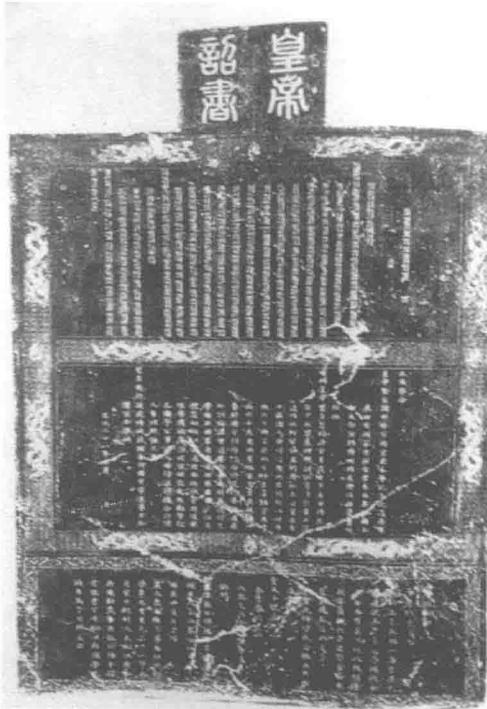
4. 加封北岳庙圣旨碑，至元二十八年（1291）二月一日，河北曲阳。罗、蔡“增”页37图六。胡9。采自《中国金石综录》。



5. 文宣王庙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 日。罗、蔡“增”页39图八。胡编目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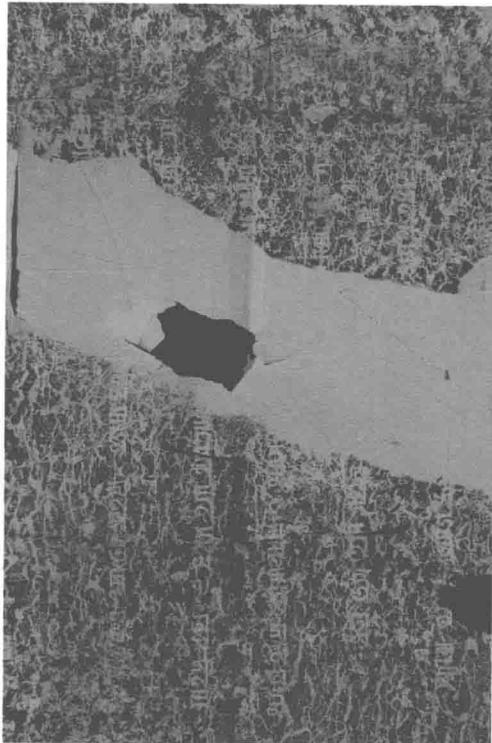
6. 孔子庙学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 日，浙江会稽。罗、蔡“增”页38图七。国家图书馆编目为各地 5244，又各地 5728。胡 13。采自国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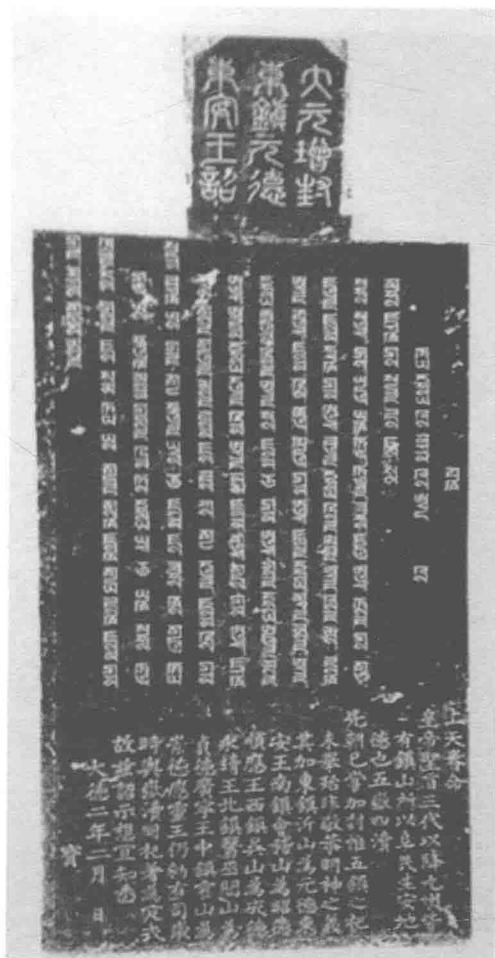
7. 孔子庙学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 日，江苏松江。罗、蔡“增”页 59 图二十八。国图“皇帝诏书碑”5728。北京大学图书馆 25515a。与上碑（6. 孔子庙学圣旨碑）文字相同。采自罗、蔡“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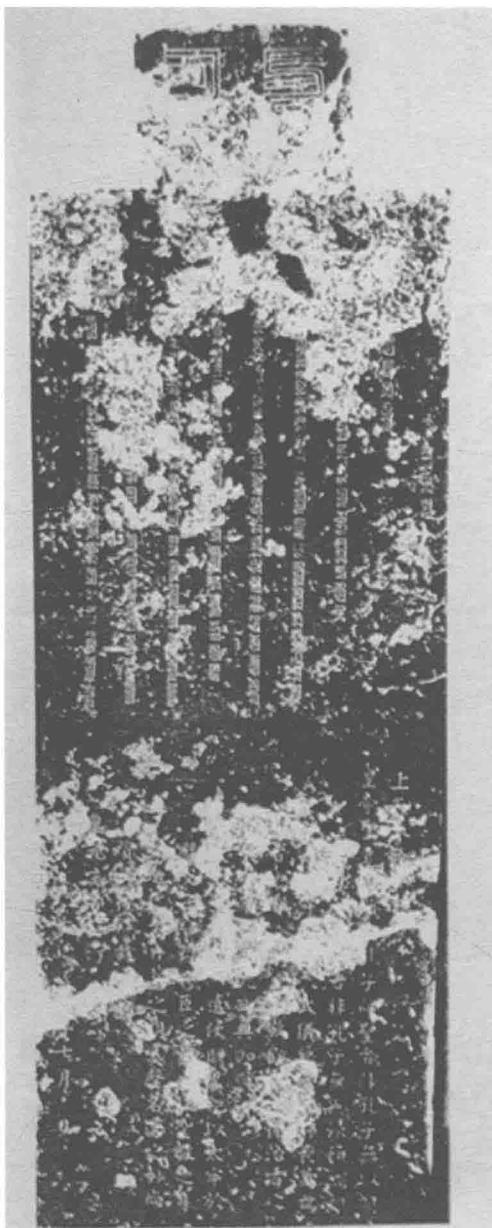
8. 东平学圣旨碑，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 日，山东东平。罗、蔡“增”页 58 图二十七。胡 14。采自罗、蔡“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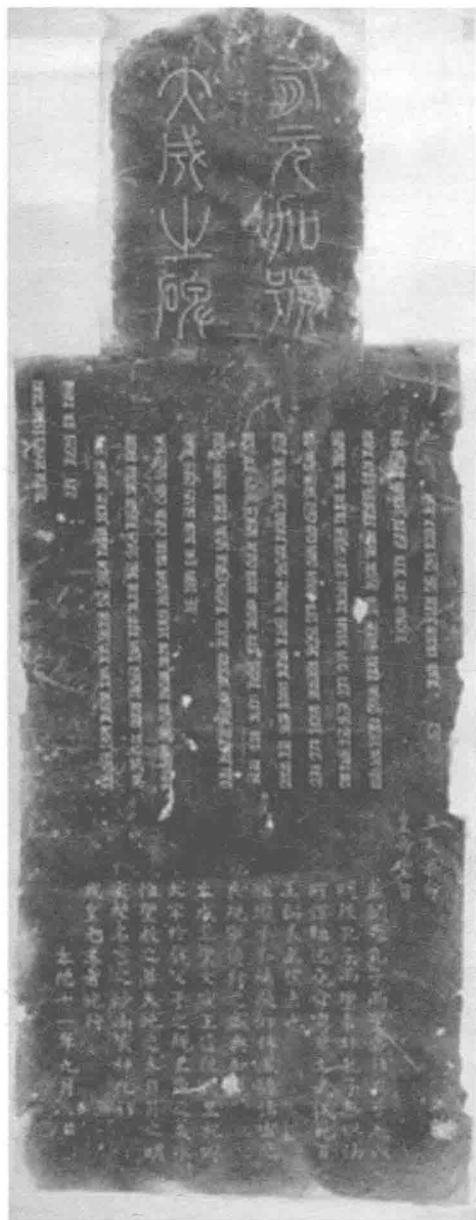
9. 齐圣广祐王庙碑，元贞元年（1295）
二月，河北磁县。罗、蔡“增”40页下附注：
原碑剥蚀过多，不能制版。胡26。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胡鸿雁老师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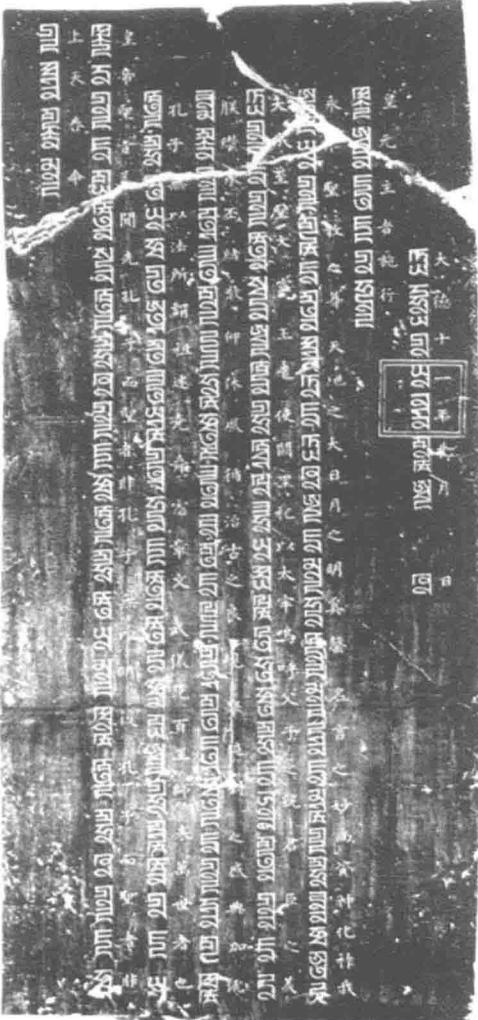
10. 加封东安王圣旨碑，大德二年
(1298)二月一日，山东临朐。罗、蔡“增”
页60图二十九。胡15。采自罗、蔡“增”。



11. 加封孔子制诏，大德十一年（1307）
七月 日，河南原武。罗、蔡“增”页 40 图
九。胡 32。采自罗、蔡“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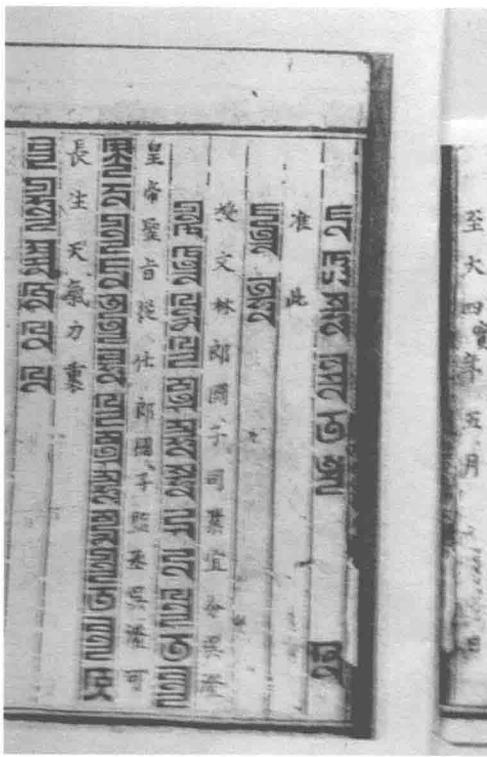
12. 加封孔子制诏，大德十一年（1307）
九月 日，河北定州。罗、蔡“增”页 42 图
十一。胡 22。高树伟君协助采用台湾“中研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拓。



13. 加封孔子制诏，大德十一年（1307）
九月 日，山东曲阜。罗、蔡“增”页41图
十。胡21。采自《中国金石综录》。



14. 特赠郑制宜制诰，至大元年（1308）
月 日，山西阳城。罗、蔡“增”页43图
十二。胡25。采自罗、蔡“增”。



15. 授吳澄文林郎國子司業，至大四年（1311）五月 日，刻本，见于《临川吴文正公草庐先生集》，明永乐四年，1406年（以下与此出处相同者，省称“《临川》，永四”。）。初据神田喜一郎著《东洋学文献丛说》（1969年3月东京二玄社）73-109页“八思巴文字的新资料”所提供图片，后采李治安文《元吴澄八思巴字宣敕文书初探》（载《元史论丛》第十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所附图片（复制自日本东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明刻百卷本《临川吴文正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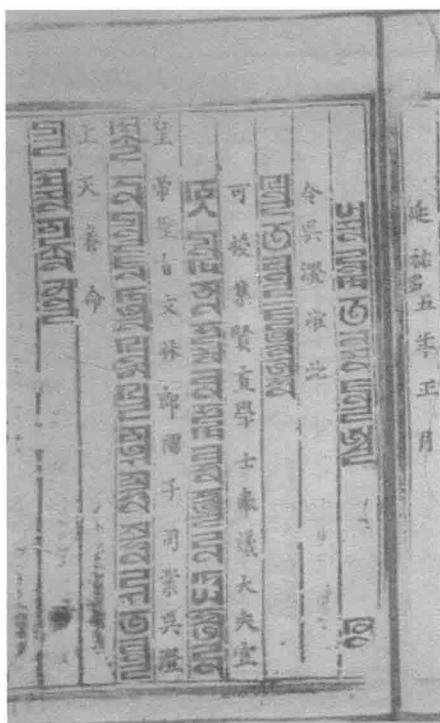
16. 特贈鄭鼎制誥，皇庆元年（1312）三月 日，山西阳城。罗、蔡“增”页44图十三。胡29。



17. 重阳万寿宫授孙德彧圣旨碑，皇庆二年（1313）九月一日，陕西户县。罗、蔡“增”页45图十四。胡39。



18. 加封孟子父母制，延祐三年（1316）七月一日，山东邹县。罗、蔡“增”页46图版十五。胡38。



19. 授吴澄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延祐五年（1318）正月一日，刻本，《临川》，永四。初据神田喜一郎 1969，后采李治安 2014。